

落实劳动保障,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更安心

本报记者 肖亮升

近年来,网约车、电商、网络订餐外卖、网约家政服务等新就业形态企业的蓬勃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形成了网约车司机、物流快递员、外卖送餐员、网约家政保洁员、网络订单一灵活就业员等新就业形态群体。如何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更安心?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南宁市总工会副主席刘东方建议加强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劳动保障,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劳动保障方面存在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劳动安全风险大、劳动保障制度缺失等问题。”刘东方通过调研了解到,新就业形态从业群体中存在人员流动较快、社会保险参

保意识偏低、法律意识淡薄等现象。而相关企业不主动承担责任,存在不愿缴、缴不起、缴不了等现象。在对外卖小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的调查中发现,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户外劳动面临较长劳动时间、较高劳动强度和更多职业健康风险等问题,有的甚至无固定工作场所、无固定工作时限、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健康安全保护措施存在缺口现象,使得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户外劳动安全风险增加。

“在平台经济以及灵活就业日益兴起的背景下,当务之急是对劳动关系判定标准进行革新,要针对平台经济的劳动特点,研究和制定既符合平台经济发

展又能切实保护平台经济从业者权益和劳动保障的具体政策措施。”为此,刘东方建议:发挥人社等相关职能部门作用,积极与行业协会、总部企业行政方或企业代表就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保护、奖惩制度等开展调研,切实解决无固定工作场所、无休息地方、无工作时限“三无”等问题。相关职能部门要督促平台企业在规章制度制定等重大事项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要求,推动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电子管理与网络平台相融合,督促平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业工会督促联合企业资源建设户外劳动者服务站,促进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体面劳动,营造社会对新就业形态从业

人员关心关爱的氛围。

刘东方提出,应督促形成合理收益分配机制,保障合理劳动报酬,保证工资水平与当地发展平衡。积极推进社会保险参保率,优先参加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整合各相关部门力量,部门协同,强化宣传引导,持续关爱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切实落实工作机制,把劳动保障落到实处。

刘东方还呼吁,应加大对新业态从业人员教育和技能提升力度,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法律意识、社会服务意识和职业道德水平,打通从业人员成长发展的通道和上升阶梯,让他们能够看到工作前景和职业未来。

建言集束
JIANYAN JISHU

野猪即将退出“三有”动物名单,相关政策应跟上

丁岳清 郭巧燕 丁波瀾

近年来,野猪成灾已经引起各方面的重视。2021年以来,国家林草局会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相关部委对全国野猪等野生动物致害问题开展了专题调研,掌握野猪分布、种群数量情况、野猪栖息地状况和人猪冲突情况,建立野猪资源数据库,绘制野猪种群分布及种群密度图。同时,由县级林业部门组织护林员等开展常态化巡护,日常监测野猪数量和活动情况。

根据调查结果,适时适度适量猎捕野猪,常态化开展野猪种群调控。确定狩猎期,划定狩猎区及重灾区,进行限时、限量猎捕。由国家林草局出台政策,支持各地组建专业猎捕队,并每年对猎捕队进行相关知识培训。猎获的野猪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按斤或按只收购,作为劳务补贴或加工成动物饲料。

一是无“调查令”,野猪成灾情况不明。野猪出生后5-12个月可交配,一年一般产两窝,一窝5到10只仔,平均寿命20年。目前,各地野猪成灾报道频出,但未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野猪专项调查,野猪分布情况、种群数量、致灾情况不明。

二是无“杀猪令”,无法科学调控种群。目前,除实施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的14个省(区),其他地区均未下达“杀猪令”。老百姓防又防不住、打又不能打,“人猪矛盾”加剧。

三是无“赔偿令”,农户损失无法补偿。目前,全国大部分省市因未制定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政策,山区农民“求补”无门。

如何平衡野生动物保护与农民

利益,已引发社会关注。笔者认为,无论野猪是否被移出“三有”动物名单,都应完善相关政策。建议:

由国家林草局部署,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野猪种群专项调查,掌握野猪分布、种群数量情况、野猪栖息地状况和人猪冲突情况,建立野猪资源数据库,绘制野猪种群分布及种群密度图。同时,由县级林业部门组织护林员等开展常态化巡护,日常监测野猪数量和活动情况。

根据调查结果,适时适度适量猎捕野猪,常态化开展野猪种群调控。确定狩猎期,划定狩猎区及重灾区,进行限时、限量猎捕。由国家林草局出台政策,支持各地组建专业猎捕队,并每年对猎捕队进行相关知识培训。猎获的野猪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按斤或按只收购,作为劳务补贴或加工成动物饲料。

出野生动物肇事损失补偿指导意见,指导督促各地尽快依法出台补偿标准办法,扩大覆盖面,对野生动物的肇事进行补偿;鼓励各地联合保险公司设立野生动物肇事责任保险。并从便民角度设置野生动物肇事申报、认定和补偿申请程序,妥善处理好保护野生动物与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之间的关系。

(作者丁岳清系农工党丽水市委主委、浙江省丽水市政协副主席,郭巧燕系农工党丽水市委副主委、丽水市政协常委,丁波瀾系农工党党员、丽水市政协特约信息员)

一线调研
YIXIAN DIAOYAN

“京津冀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调研——

创新不足、融资难、关键技术薄弱,仍是困扰企业发展“瓶颈”

本报记者 张原 李宁馨

京津冀区域不仅拥有全国乃至全球最先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也是我国大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发源地和承载地。塑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三地民营企业生存发展和区域竞争力的提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们民营企业研究课题组从京津冀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的视角出发,开展多维度问卷调查,并形成调研报告进行对策建议,希望能够为民营企业反映一些实际情况。”天津市政协常委董雪锋创办的“鼎泰丰下午茶”作为天津市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互助服务平台和营商环境“助推器”,以“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为主题的研究活动已经开展了3年。课题组通过互联网发放问卷6523份,选取京津冀三地中小微企业的管理者,涵盖18个行业,从民营企业及企业家的角度审视营商环境,从当前企业运营情况、经营信心、信任成本、享受优惠政策、自身发展、投资意愿问题等方面对京津冀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进行了调研分析。

调研组发现,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各项支持政策的逐步落实,民营企业发展势

头较好。具有信心的民营企业主要分布在信息技术、交通运输、传统制造等行业中,随着京津冀对信创产业应用场景的不断学习,也给下游制造业较好的发展信心。建设,也给下游制造业较好的发展信心。“民营企业应尽快完成转型升级,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充分发挥大数据时代的优势,加快民营企业创新的步伐。抓住这一机遇有利于实现民营企业实现更大的发展,有效提升企业经营的效率。”董雪锋说,从调研数据看,此类经营良好的企业拓展市场的需求迫切。

调研同时发现,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融资困难、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关键技术支撑薄弱等是当前京津冀民营企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董雪锋分析认为,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民营企业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来提高市场竞争力是关键,也是其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京津冀民营企业中制造业占绝大多数,但由于自身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极易受到市场经济波动和国家政策的影响,最终导致民营企业发展创新能力降低,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民营经济的转型升级。

京津冀民营企业绝大部分为中小型

企业,与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企业相比,自身规模小、经营周期短、生产技术水平低、信用等级不高,对于金融机构而言为其进行贷款风险较大,也会增加商业银行交易成本,因此民营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民营资本,不仅融资金额少,成本也会高于银行信贷。“在经济下行发展的压力之下,民营经济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将严重阻碍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也就无法实现高质量发展。”董雪锋说。

民营经济的健康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而要改善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政府需要有大的作为。从国家层面看,要完善立法,以法律的形式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从地方政府层面看,要在国家法律框架内,制定好保护和支撑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制度,确保它们生存稳定。另外,要想彻底打通国民经济发展的阻碍,还需要将实体经济与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信息技术相融合。但目前大部分中小民营企业对于关键技术的了解欠缺,仍属于发展的薄弱环节。

对于当下面临的问题,如何才能促进京津冀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建议:

针对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提高融资效率问题,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可结合地方发展特色,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增强对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实现企业间平等竞争。如用普惠政策为创新企业提供“全成长周期”的针对性服务;由政府引导金融机构加快转型升级,充分利用好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减少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民营企业自身要不断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学习先进的管理知识与经验,加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从而获得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青睐。

对于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政府要全面推进“放管服”改革,激发市场活力。通过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实现政府部门间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充分利用好网上平台,提升“互联网+政务服务”水平。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切实解决政策落地问题,推动民营企业健康高质量发展。



“智囊团”助农网络销售

日前,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石镜乡政府工作人员帮助村民在网上直播销售刚刚出锅的红薯丸子。每到冬春季节,石镜乡邓林村村民都有制作油炸红薯丸子的习惯,除了自家用,还对外销售。为增加群众收入,石镜乡成立了一支由青年工作人员、网格员、青年学生等组成的“智囊团”,他们用网络直播的方式帮助当地村民销售红薯丸子、山芋粉、菜籽油等“舌尖上的美食”,力促农民增收致富。 贾宁 檀志扬 摄影报道

农用地“占补平衡”要有质控标准与补偿机制

徐宗侑

近年来,面对城市化建设不可避免将加快对农用地占用的现状,国家为保护基本农田,提出了非农用地“占补平衡”策略。但笔者调查发现,在既有耕地少、存量不足、增量匮乏、数量锐减、质量下滑的基本国情下,“占补平衡”由于缺乏刚性的技术质量标准和监管、督查、审计手段,往往会出现占多补少、占近补远、占优补劣、占水田补旱地、占“熟地”补“生地”、占平地补坡地等情况。

保证耕地数量与质量,才是最终决定粮食绝对安全的唯一根基。耕地质量取决于耕层厚度、团粒结构、土壤容重、有机质含量、全氮含量、碱解氮含量、有效磷含量、速效钾含量等综合指标。但近年来“占补平衡”农用地测定结果显示:“被占”与“补进”的耕地,质量水平一般相差3—5个等级,单产水平几乎打对折。有的“补进耕地”一不保水、二不保肥、三不保土,适耕性极差,以至于“占补平衡”只是“数量概念的平衡”。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占补平衡”农用地质

量问题,笔者认为,必须由国家、省级以上人大授权,组织第三方专业部门、相关专家,依法制定“占补平衡”中基本的土壤理化指标,作为基准质控标准。同时,建立“后续培肥地力基金”,并事先明确需要弥补的质量标准。

通过“占补平衡”获得“农用地转非”者,应当依法、按时、足额缴纳“后续培肥地力基金”,用于“补进耕地”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科技、劳力投入补偿,解除农民因良田沃土面积缩小、单产降低而返贫的后顾之忧。

建立各级农用地数量、质量监管、督查、审计体制与运行机制,实施“占补平衡”的法定质控标准验收、“后续培肥地力基金”的落实与投入等,进行常态化监管。

总而言之,“占补平衡”只有在法定质控与审计标准及建立“后续培肥地力基金”运行机制前提下,才谈得上保护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也才谈得上确保中国人牢牢端稳饭碗。

(作者系九三学社重庆市委“思想建设与理论研究中心”副理事长)

加强涉外医疗建设,适应北京城市发展战略

程雁

北京“十四五”发展战略将实现首都四大核心功能,将北京培育建设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其中,国际标准的医疗服务是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至关重要的内容。但目前,北京涉外医疗还存在发展滞后、布局有限、服务能力较弱等问题,与北京国际大都市发展战略目标还存在不少差距。

现阶段,公立医疗机构是北京涉外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方。这些公立医疗机构主要分布在主城区位置,共约200张床位可以为主城区工作或居住的外籍人士提供国际医疗服务。民营医疗机构也提供一定的涉外医疗服务,多集中在朝阳区外籍人士居住地,关注高端医疗需求并与国际保险公司建立了付费关系。此外,还有公立与民营机构合作建立国际医疗,为外籍患者提供服务。越来越多的国际医疗也体现出向主城区外扩展的趋势。根据《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四五”时期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北京同仁医院主体南移,除了带动东南地区医疗水平,还将提供高水平的国际医疗服务。通州区的新建医院全部匹配了国际医疗部等,着力将通州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

但北京市涉外医疗发展仍然滞后于北京市开放发展的相关规划,健全涉外医疗服务建设刻不容缓。为此建议:

一、应高度重视北京涉外医疗发展。针对目前涉外医疗发展缓慢、“九龙治水”的问题,建议北京市政府成立由卫生健康委牵头、多部门组成的涉外医疗发展与规划委员会,统筹涉外医疗的资质审核、宣传、法务、管理等工作,建立健全涉外医疗行业管理体制,实现涉外医疗资源的有效整合。

二、科学合理布局涉外医疗资源。《“十四五”时期健康北京建设规划》中未体现涉外医疗相关规划,可根据北京市城市发展相关规划设定的“三城一区”,科学布局涉外医疗资源,与外籍人士工作、住所范畴相匹配,优化服务流程,加大服务供给,增加急诊通道,提高就医可及性。

三、加大涉外医疗服务供给总量。鼓励公立机构与民营机构加强合作,成立区域性涉外医疗服务医联体,实现优势互补。适度放宽外资医疗服务进入门槛,吸引国际知名医疗机构来京开设医院、门诊、检测与影像中心、特种疾病治疗及疗养院等。加大家庭医生与社区医疗提供国际医疗服务的能力,尽快解决涉外医疗资源紧张与不均衡的矛盾。

四、加强涉外医疗服务保障能力。涉外医疗的医事服务费较高,要合理制定涉外医疗服务价格,优化国际医疗保障和支付服务。针对外籍人士门诊、手术和住院数据相对缺失,建议搭建“首都涉外医疗服务云平台”,实现涉外医疗健康数据共建共享,推动咨询、翻译、诊疗过程和结果的管理和服务。

五、提升涉外医疗跨文化服务水平。配备一定数量的英语水平较高的医护人员,同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多语种服务。医务人员还要了解不同国家和区域的文化,提高跨文化的医疗服务能力。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委员)

应尽快出台报废光伏产品回收利用制度

本报记者 范文杰

近年来,宁夏光伏产业迅猛发展,截至2021年6月底,宁夏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40万千瓦,居全国第七,光伏产业已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支撑。

“光伏产业虽在宁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面临一些问题。首先是使用寿命短。”自治区政协委员刘金星说,光伏组件作为光伏系统的主要部件,其设计使用寿命是25年左右,但早些年产品在在设计、材料、工艺等方面都不成熟,部分产品在运行10年至15年后即出现较明显的衰减老化,对光伏电站造成较大隐患。同时,退役产品多。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预测,我国将在2025年左右面临大批量的退役光伏组件,2030年将累计产生约150万吨,且在2060年之前以每年约30%的速度递增。

宁夏回族自治区也以社情民意反映,光伏产业具有废品污染较重,回收效率低的特征。由于报废组件主要由金属、玻璃、有机物、无机物等构成,不当的处置会造成

严重的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另外,光伏组件中稀有金属含量只占组件的1%,目前采取的无机酸溶解法、固定容器热处理法等,回收效率低、污染严重。

“目前,宁夏对报废光伏组件的政策关注度较小,尚没有针对性较强的法规。”针对这些问题,民盟宁夏区委建议,相关部门应制定光伏组件报废及回收、处置方面的政策,鼓励相关企业回收利用。自治区光伏产业园分布广泛,部分地区光伏产品已服役近20年,正面临更新换代问题,应以此为契机,选择1至2个光伏电站进行试点,回收利用淘汰的组件,为后期形成工业化的处置能力奠定基础。

刘金星委员则建议宁夏建立相关技术标准。目前国内回收利用少,且缺少技术标准和规范,自治区发改委和科技厅等相关厅局,应列专项资金,适当鼓励区内企业投入光伏组件报废处置的研发,并组织相关机构及企业,对报废光伏组件的拆解、处置、回收环节开展地方标准的制定。

创新培养模式,让社区工作者成为“办事能手”

本报记者 王泳

社区安,城市才能安,社会才能安。然而现实中,很多社区人少事繁、工作千头万绪,如何让社区治理更精细化、系统化、现代化?山西省太原市政协委员、迎泽区政协主席赵树文建议,建设高素质社区工作者队伍,提高其履职能力,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现代化。

“社区工作任务重、压力大、头绪多、琐碎复杂,导致许多社区工作者‘身兼数职’,总是靠老方法、老经验办事,工作疲于应付。”赵树文在调研中了解到,许多社区工作者缺乏社区专业学科背景,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培训,对社会工作方法和技巧比较陌生,难以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系统化的服务。还有个别社区工作者进社区工作的目的,只为一份安稳的收入,并没有把社区工作作为一项事业对待。“社区工作者的职业素养、专业技能、创新意识等方面与实际需求还相距甚远。”

赵树文认为,太原应尽快构建市、区、街镇三级培养机制,培育“一人多岗、一专多能、一口受理、全岗通、全科服务”的社区

工作者,打破社区工作的条块边界,探索实施社区间轮岗培养制度,使社区工作者成为社区“全科医生”和“办事能手”。

针对部分社区党组织作用发挥不明显,组织党员参与社区民主协商等活动不积极等问题,赵树文建议将社区工作者纳入人才发展规划,创新“师徒制”培养模式,加强社区人才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建立“在人才中发展党员、培养党员成为人才”的双向培养模式,切实解决治理体系不完善、能力不适应、责任不落实等突出问题。

赵树文表示,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是社区治理的关键力量,要在待遇和负担上做好“加减法”: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健全等级绩效薪酬制度,提高薪酬待遇;拓展职业发展通道,推动社区专职工作者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注重从年轻、能力强、文化程度高的社区工作者中选拔培养一批骨干力量和后备力量。“同时,探索选派管理服务经验丰富的机关事业单位年轻干部到社区挂职锻炼,丰富基层社区工作方式方法,推动社区工作创新发展。”